

最后的名士

——近代名人自传

ZUI HOU DE MING SHI

杨光
编著

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
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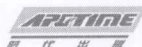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 山 书 社



最后的名士

——近代名人自传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名士——近代名人自传/杨光编著. —合肥:黄山书社,2008.11

ISBN 978-7-5461-0059-3

I. 最… II. 杨… III. 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7092号

书 名:最后的名士——近代名人自传

编 著 者:杨光

责任编辑:张向奎

特约编辑:李力夫

封面设计:钱志刚

出 版:黄山书社

社址 合肥市圣泉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发 行: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1.75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08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8.00元

目 录

导 言

我，我自己？	1
--------------	---

大师背影，今何在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 蔡元培	23
自述学术次第 / 章太炎	34
三十自述 / 梁启超	51
自序 / 王国维	58
实庵自传 / 陈独秀	65
自叙传略 / 鲁迅	82
欧游回忆录 / 刘半农	85
《新潮》之回忆与前瞻 / 傅斯年	129

博学慎思，但求真

医学与佛法 / 丁福保	143
六十年之回顾 / 邝富灼	156
自述 / 吕思勉	172

最目

自传 / 钱基博	185
我的生活态度之自白 / 李石岑	194

岁月不居，真名士

六十年之回忆 / 张寿镛	213
藏园居士六十自述 / 傅增湘	220
到巴黎去 / 宋春舫	234

今时昨日，交相错

我的打鼓时期已经过了么 / 洪深	241
南闽十年之梦影 / 弘一法师	250
悲鸿自述 / 徐悲鸿	259
白石老人自述 / 齐白石	284

文人骚客，自风流

自传 / 柳亚子	325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 郁达夫	331
大学时代 / 庐隐	339
我是扬州人 / 朱自清	352
自剖 / 徐志摩	358

后 记	373
-----------	-----

导 言

我，我自己？

自传：自我的制造

根据我们惯常的观念，下面所描述的心态是显而易见的：仰望高台之上滔滔不绝的演讲者时会自然的生出畏惧之感，而当有人从你对面走来，并且挥手向你致意，互相寒暄，并且做一下自我介绍时，那种温和的对视会不由得使人生出某种莫名的温情。这个有趣的比拟尽管并不审慎严谨，但是形容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声名煊赫的知识分子所撰写的自传却恰如其分。

对于平民大众来讲，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形状并不难以把握。典型的知识分子所充当的角色是自囿于高高的、象征着智慧与荣耀的象牙之塔内，偶尔探出头，从塔顶向外散发那些代表他们充满说教的文字，而平民大众（common men），会延颈仰望，等待着这些知识分子光辉万丈的思想给他们带来启蒙的讯息。

这并非想象之辞，甚至知识分子本人也自命如此，就像是被视作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鲁迅（1881~1936年），在其一篇题为《自嘲》的诗中写道：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然而，这些知识分子所撰写的自传，则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讯息：知识分子并非活在自我搭建的孤寂与高傲之中，而是从象牙之塔上徐徐而下，来到平民大众的中间，试图向他们展示自己完全的形象。

就像我在前面所使用的那个比喻一样，知识分子游走于自我封闭与大开大放之间的癖好让我们颇感兴味：他们无疑是最特殊也最有趣的一个族群，从某种方面来讲，他们本身应当被视为是中产阶级（“Middle-Class” or “Middle-rank”）的一部分，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游走于各个阶层之间——通过他们的文字被印刷、出版、发行、销售并且被读者购买，他们的文字作品成为他们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根据不同阶层的读者，他们的触角伸向他们的读者所在的阶层，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作品毫无疑问成为了他所延伸出来的身体。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个身体似乎更为本质，也更为重要，它是由他所撰写的作品所构成的。能写会书是知识分子不同于其他族群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使他们有能力越界，逾越了属于自己的小圈子，而使自己延伸出来的身体向着更为广阔的世界扩展；而知识分子所撰写的自传，则为这个延伸出来的身体正名，使之名符其实。



这个使知识分子的更本质的、延伸出来的身体变得恰如其名的自传应当以何种方式看待？

轻易地给与一个仅仅存在模糊概念的事物以一个很具体的名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除此以外，我们无计可施。对于自传的一个很直观的看法是，自传是自己对自己生平的描述，属于传记的一部分。这确实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但是，一份求职的履历、求职信上的自我简介，或是我们在上面所引用的那首名为《自嘲》的诗句，是不是也属于自传的范畴呢？

这或许有些玩弄词藻的意味，但是仅就自传来说，它确实提供了无数的可能性，就像一个庞大无形之物，拥有着数不清的名字。但是无论如何，它的作用就只有一个，描述写自传的这个人。

这样解释未免失之笼统，因为善于修饰的知识分子不会简简单单地开列自己的生辰年月、籍贯、所任的职务，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份毫无生气的履历表。自传起码是应当充满着文学色彩的，堆叠着各式各样的形容词、副词，最好还要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扣人心弦的高潮以及一个不落俗套的结尾，附加着精挑细选的细节和变换丰富的情感。这就要求自传的撰写者有着高超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同时也宣告撰写自传的工作非知识分子莫属。

做出这样的判断基于如下一个原因，即这些自传不会被高束庋藏，而是需要拿出来发表，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它是知识分子外化出来的，专门作为与平民大众接触的身体的一部分，而且

是“最像自己”的那一部分，所以，履历表式的自传肯定不会拥有读者，进行文学的点饰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撰写任何文字典型的特征，而且也是一项必需。

但是，至少从我们所习惯的考虑方式来看，自传很明显的应该与知识分子所创作的其他的文学作品不同，自传对于想象力的要求偏低，换言之，它本应该天生摒弃天马行空的描写而钟情尽可能地贴近真实，它应当是撰写者亲身经历的活生生的再现，它里面的人物应当是确凿存在的，事情是真实发生的，而情感也应当是恰如其时的。

这很明显的意味着，自传应该与我们通常定义的文学作品，和那些小说、散文、诗歌不同，它应该是独立出来的个体，难道不是这样吗？

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很少有自传不被归入文学作品当中的，因为知识分子作为文人，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书写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而当他们撰写自己的自传时，他们会毅然决然地将自传与他们日常所书写的那些文字严格地区分开吗？

但是，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知识分子本性使然，无论如何，被知识分子捏在手里的自传成为了这样一种事物：一个主人公是“我”的文学作品。不过，这也有助于我们扩大我们的搜索领域，因为明白这一点，自传的范围会更为广博，它会包括所有与此人身世有关的文字，包括这个人对童年点点滴滴的回忆、对某一亲身经历的事的记述与感想，甚至是一时感情的流露而自觉地在纸上的书写。



不得不承认，我有意扩大了自传的范围，这完完全全是为了照顾自传的主角——那些以玩弄笔杆子为志业的知识分子。这样较为符合他们的身份。

那么，很自然的，我们有必要对我们所要讨论的主体，自传的书写者——这些知识分子做一个简单明了的探讨。实际上，我在上面已经开始悄悄地为他们定义，告诉诸位，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族群，“游走于自我封闭与大开大放之间”。我们接着这个观点向下讨论，以期对这些知识分子的矛盾之处做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他们有什么权力和资本可以屹立于如此之地？

答案就是，所有的权力与资本几乎都是这些知识分子白手起家，一手创造的。最为典型的，也是最为人所不注意的一个表现，就是这些以文为生的知识分子，很少在自己的作品上署上自己的真名实姓，而代之以笔名，甚至有的时候自传也不例外。

典型的像是庐隐（1898~1934年）充满伤感的自传，这本书在她死后出版。但是除了细心的人可以在书前的插图里所影印她的手稿中发现“黄庐隐”的签名从而得知她的姓氏以外，在这本书的正文处，几乎无法找出这位女作家的真名实姓：她有意地向她的读者展开心扉，却似乎不愿意让读者知道向他们展开心扉的这个人究竟姓甚名谁。甚至我们可以推测，假使这本书在作者生前出版，那么即有可能，就连书前的插图也不会出现这个女子的真名实姓。



这是1934年所出版的《庐隐自传》的插图页，在左下方所影印的庐隐的手稿上，可以模糊地看到“黄庐隐”的签名。

但是情况也未必尽然，例如沈从文、张资平以及许钦文就将自己的名姓堂而皇之地以大而友善的字体印刷在他们自传的封面上。不同的人会对此采取不同的看法，这毫不奇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代表了一种自由选择的权力：知识分子可以自由选择在公众面前开放自我的程度。很多的时候，在公众心中，笔名甚至替代了这名作家的真实名字，真实的名字反而被遗忘。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广为人知的鲁迅，以及我在上面所提到的庐隐，还有废名、叶圣陶、茅盾、老舍、巴金，不胜枚举。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表明作家有意地通过使用笔名而在公众中再创造出一个作为特定的自我，而这个名字就成为了这个特定自我的象征符号，使其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暂时分开。

这样的看法是否过于偏激？事实上，无论以何种方式对自传以及撰写自传的知识分子做出一个牵强的定义都是偏激之举。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有着不尽相同之处，尤其是在表面上，这些知识分子本身就对亦步亦趋充满反感，对刻意仿效避之不及，他们自认为应当突出独立的个性，以彰显自己的不同。在对大众的观念上，他们倒是达成一致，认为大众应当是他们的服务对象，因为每一个识文断字的大众都有可能是他们的潜在读者。自传，作为一个自我书写的文学作品，当它一俟发表，就不可避免地背负上传达作者意志的工具，并且以公开作者本人的方式，向大众推销作者自己。

时 与 人

然而我们这样定性可能并不周全，因为公心之人并非举世无存。以现代教育的实践家和北京大学的校长而名称于世的蔡元培

即是如此，他沉浸于工作之中的教育家和学者的自我世界。他叙述自己在北京大学中的所作所为，他所实行的改革以及他的进一步计划，但是，当他在文字的最后为自己在干被人看来已经是卓越不凡的工作而抱持着一种“不胜惭愧”的谦虚之情时，他已经被视为一个可敬的实干家而非一名通常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了。

当蔡元培将教务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时，他的学生——日后的知识分子们却嗅到了更为新奇的气息——一种夹杂着忧愤与亢奋的古怪的气息。当我们上文提到的庐隐进入北京成为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的一位学生时，她猛然间感到自己不由自主地卷入了突如其来的时代风潮当中。她入学的年代恰好是1919年——这一年后来被认为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有着特殊意义，很多的事情在这一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激进的知识分子发现了突破口以宣泄自己长久以来被旧式礼教所压抑的情感，街头政治大行其道。一种新的推销自己观点的方法也应运而生：学生们将成捆的传单散发给匆匆走过的行人，在讲台上像先知一样声嘶力竭地预言这个腐败而软弱的国家行将灭亡。

这场风潮在这一年的5月4日达到极致，为了抗议政府有可能会签署的卖国条约，北京学校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走上街头去示威游行。当政府以一贯敷衍塞责的方式试图用时间来磨灭学生的斗志时，学生们被激怒了。他们焚烧了一处民居——因为他们相信屋主是个卖国贼，并且痛打了一名看上去像是他们所要寻找的卖国贼的人。

没有证据证明庐隐参与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运动，但是根据她的自传所言，她是这股风潮的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她如此忘情地投身其中，独自去安慰一位新式“恋爱自由”而“忍受群众



1919年“五四”运动中站在高台上演讲的学生

的压迫”的女同学，并且和她一起面对将“新议论”“畏如洪水猛兽”的“浅薄的同学”的“冷嘲热讽”。在1919年12月所发生的“福州事件”（这一事件一直被认为是“五四运动”的延续）当中，已经成为了学生会干事的庐隐告诉她的自传读者们：

这些被压迫几千年，才得解放的民众，真如同发了狂的，今日这一个团体开会发宣言，那一个团体请愿，游行大示威，当然这是学生会的买卖到了，我整天为奔走国事忙乱着，——天安门开民众大会呀，总统会请愿呀，十字路口演讲呀，这些事我是头一遭经历，所以更觉得有兴趣，竟热心到饭都不吃，觉也不睡的干着。

当庐隐沉浸于北京新风气给她所带来的“兴趣”与愉悦当中

时，一名叫做章衣萍（1900~1947年）的文学青年怀揣着简单的梦想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他年方19岁，在他满怀着热望与期许当中，北京是新文化的梦幻之城，“北京大学那时正是新文化的最高的学府，是中国新思想的发源地”，而且那里还有他“所崇拜的大师”。

但是，当这位充满幻想与希望的青年到达“中国文艺复兴的渊源”、“中国一切新思想的发源地”和“东西学术的汇总”的北京大学时，这位青年一下子发现自己已经从梦想之舟上跌落，落入现实的深渊当中。这时他才发现，他的“唯一的问题是怎样才可以不至于饿死。”这个可怜的青年不得不在“沙漠的北京城”里寻找求生之道，在工余的时间前去他所敬仰的大学做一个“偷听生”，和一群和他一样的“穷小子”混迹一起，听他们谈论“Marx 这样，Kropotkin 那样，Rousseau 的政治学说怎样妙，Byron 的诗怎样雄壮，Freud 的心理分析怎样奇怪”，最后，这个年轻人得出了一个可悲的结论：“他们借着一些伟大人物的名字和学说来欺骗自己，逃避现实，忘却眼前的一切痛苦，晚上可以整月的没有钱买油点灯，便早早的躺在床上做一些 Nihilism, Communism, Anarchism 的梦”。

章衣萍对新文化下的青年所做出令人沮丧和带有讽刺的评论多少具有一些谶语的味道——更多的人将新文化作为宣泄感情和挣脱束缚的工具，甚至是一种时髦的点缀。章衣萍与庐隐的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不仅仅是一种性别上的区别，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带有自我个性的思考——趋时者与孤独者，参与者与旁观者。

情感动物

惯常的经验使我们很容易接受这样的观点：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往往会成为令人瞠目的转折点，人对事，皆是如此。花园里散步时的遐思，暗夜中使人猛然惊醒的梦魇，甚至是旁人们漫不经心的话语，都有可能成为某个人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只要这个人心灵足够敏感，并且愿意花费时间和头脑来对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进行无限制的思考，那么这种细节就成为了这个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情。而这个细节的意象，也会反复地出现。就像是一个人不断地从同一个噩梦中惊醒一样，无论这个人是否服膺荣格的潜意识理论，他都会将这个梦境作为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暗示，并且时时存有疑虑之心。

这种细节的暗示在鲁迅的自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他篇幅短小，犹如在一篇求职简历的自叙中，鲁迅用了很简短的一句话来表明自己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这个原因是一个极为简单的细节：作为一名留学日本的医学生的年轻鲁迅，看到了“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这句话也许在某些长篇大作中被简单地忽略。但是，它出现在一篇不到 850 个字的文章里，这就足以让人反复推敲。而当我们把这篇如此短小、并且缺乏文学性的自叙看完以后，就会发现，这个细节是鲁迅这篇自叙中唯一一处细节的描写。这篇自叙的其他部分完全都是如同例行公事般的概述——他出生在哪，上过哪些学校，并且担任过何种职务，写过什么作品。



日俄战争中，一位中国人作为俄国密探而被日本士兵施行砍头的刑罚。旁边围观着众多的中国人。当时正在日本学医的鲁迅也许正是看到了这幅图片而改变了他的志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鲁迅在《自叙传略》(1925)与相隔一年的《藤野先生》(1926)中的细微差别：《自叙传略》中提到的是“被斩”，而在《藤野先生》中则是“要枪毙了”。

干枯如同账本一般的自叙出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细节描写，只能让人如此理解：自述者经历这一细节的那一刻，就如同他的童年、他的学生时代，以及所从事的那些工作所花费的时间一样漫长，这件事情同时也成为了他在自传中如流水账般平淡无奇生活的一波惊澜。而在实际上，这一细节不仅仅被鲁迅当作是他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的一个诱因，同时也成为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一个取之不尽的素材。这个细节后来被无限地放大，我们可以从鲁迅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发现这一点。

我们不妨看一看被中外批评家推崇备至的《阿Q正传》，主角阿Q唾沫飞溅讲述杀革命党的头是一件“好看好看”的事情，